**为什么无产阶级不是多元身份中的一种？**

**——兼论电影《罗马》如何反映了毛泽东思想**

【阿根廷】虚无制造机

[](https://band.us/band/86180635/board/search/%E8%AE%BA%E6%97%A0%E4%BA%A7%E9%98%B6%E7%BA%A7%E4%B8%8D%E6%98%AF%E5%A4%9A%E5%85%83%E8%BA%AB%E4%BB%BD)

舆论对阿方索·卡隆的《罗马》所做出的最滥情的赞美与最尖刻的抨击同时注意到了这部电影中的“女性主义要素”。赞美者称赞《罗马》通过分享一种女性共同的受压迫经验为超越60年代末分裂墨西哥社会的历史创伤而寻找到了出路；带有正统马克思主义背景的批评者则指出这种温情的女性主义叙事掩盖了墨西哥社会的巨大的阶级鸿沟。正是在《罗马》的批评者这里，我们遇到了关于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阐释的抽象的普遍性问题。根据黑格尔，知性在从现象多样的特殊性中把握同一的本质规定性的过程中错误地将特殊性与普遍性对立了起来。也就是说，在这种模式下，普遍性的建立意味着对现象中某些被认为是非本质性要素的“舍像”（保罗·斯威齐在阐释《资本论》第一卷令人费解的前几章时用到了这个词，黑格尔则在精神现象学导言中将之比喻为“死亡”），通过这种方式，知性得到的普遍性就是抽象而贫乏的，缺少具体规定性的。比方说，为了成为城邦共同体真正的普遍一员，一个人必须学会放弃特殊的家庭利益，从城邦的普遍利益出发进行决策（为了解决理性国家与市民社会个人主义之间的矛盾，黑格尔引入了至少在概念上永恒延续的战争，彻底颠覆了康德对永久和平的天真妄想）。在黑格尔看来，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就是一部描绘普遍的城邦政治与特殊的家庭伦理间对抗的戏剧。“抽象的普遍性”原则之所以适用于《罗马》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背景批评者，则是因为在女性主义叙事与阶级斗争叙事争夺文本解读的主导符码地位的过程中，两者之间据说必然是相互排斥的，一旦一者晋升为了普遍的，能够对一切情节冲突做出根本性解释的主导符码，另一者就只能屈居于次要的特殊性地位而遭到“舍象”

[](https://band.us/band/86180635/board/search/%E8%AE%BA%E6%97%A0%E4%BA%A7%E9%98%B6%E7%BA%A7%E4%B8%8D%E6%98%AF%E5%A4%9A%E5%85%83%E8%BA%AB%E4%BB%BD)

然而《罗马》的两种批评者全部忽略了一个事实：就这部影片的镜头运用形式而不是情节内容来看，《罗马》与其说是含情脉脉的倒更不如说是冷漠疏离的。在片尾最为人所称道的高潮场景中，主角克里奥在自己不会游泳的情况下走入海水中救回了被汹涌海浪推走的雇主的孩子。最后，克里奥与雇主一家人激动地拥抱在一起，但正如斯拉沃热·齐泽克所注意到的那样，片尾场景中这个在技术上令人称道的长镜头并没有采取克里奥的主观视角，而是使用了极为机械僵硬的广角镜头平移，客观镜头以近乎漠不关心的均匀速度从沙滩移向海水，又从海水返回沙滩，完全不顾克里奥的行动，使她经常偏离画面中心。以不带感情，冷眼旁观的姿态，镜头运动将本该是高潮情节部分中的戏剧张力取消了，“摄影机在这里呈现出一种奇怪的惰性，拒绝参与到剧情之中”。①同样怪诞的镜头运用也出现在了影片的开场，当克里奥在雇主的住宅中四处走动忙着家务，影片以三个镜头展示了住宅各个部分的环境，与片尾类似的镜头运用第一次出现，并且室内场景将广角镜头的不合时宜完全暴露了出来，镜头被固定在住宅场景中心，缓慢地匀速摇镜，镜头对克里奥的漠不关心更加凸显了出来，其运动完全没有跟随人物的运动而自行其是地进行引机运动（这不是惯常使用的那种以人物在画面中相对位置的变化表现运动感的技巧，证据在于在第二个镜头中，即便克里奥正在进行纵向运动，镜头还是继续摇动，单纯将克里奥从画面中心“甩了出去”）。

一些敏锐的评论试图将不自然的镜头运用解释为导演阿方索·卡隆对待童年回忆的冷静态度。然而相反的证据却能够证明这种冷静态度并不属于导演的客观凝视，虽然这么说有些自相矛盾，但我们完全有理由认定种冷静的客观态度恰恰属于主角克里奥。《罗马》的第一个镜头是一个令人难耐的奇长无比的空镜，以静止的俯视视角拍摄地板瓷砖，观众通过泼水、肥皂泡与音效才能够理解克里奥正在镜头外劳作，喷气机的意象也在倒影中第一次出现（非常巧合的是，参加了2019年圣丹斯电影节竞赛和上海电影节展映的马其顿纪录片《蜂蜜之地》以几乎完全相同的方式使用了喷气机意象：当喀迪丝在坟墓旁哀悼母亲时，喷气机略过的轰鸣声作为外在力量对日常经验的介入吸引了她的注意力）。这个客观镜头所处的位置，被捆绑在缺少经济回报的艰辛家庭劳动与强大的资本主义力量的夹缝之中的位置，难道不就是作为白人资产阶级家庭所雇佣的原住民仆人的克里奥所处的主观位置吗？

从这个奠基性的镜头延续下去，《罗马》通过诡异的镜头形式所表达的一切疏离感就应当被归结为克里奥从摄像机这一不可能的位置出发对自身的主观凝视。这种对自身位置的冷漠凝视，这种凝视与眼睛，主体与凝视的分裂，正表明克里奥并没有真正投入到雇主在主观上试图为她提供的人道关怀中去。相反她正在力图寻求一种事不关己的冷静位置能够与灰色异化的雇佣劳动生活拉开距离。这种发生在镜头形式中的张力在一个细节中“传染”了电影的情节内容：在高潮场景的尾声，当克里奥终于有机会说出自己实际上根本不想生下孩子时，搂着她的雇主却在不断念叨着“孩子们没事，孩子们没事……”。这个非常容易，也已经被几乎所有评论所忽视的细节显然表明克里奥的内心挣扎并没有成功传递到雇主那里，后者在此时关心的仍然是自己的孩子而不是克里奥……虽然面临着类似的受困于父权束缚的“女性经验”，但在最后一刻，不仅仅是克里奥没有将自己视作雇主家庭的一部分，雇主也没有真正接纳克里奥。含情脉脉的表面隐藏着雇主对克里奥的双重剥削——不仅仅在经济上，更是在情感上，廉价的伪亲情贿赂只是为了更好地延续经济剥削。面对挫折，雇主与克里奥的承受能力是完全不同的，至少雇主可以选择在离婚后就业，而克里奥则不得不在清扫院子里的狗屎时仍然忧愁自己会不会丢掉佣人工作。这种地位不对等的矛盾也隐含在了电影情节的最后一个段落中：克里奥产下死胎后不久，雇主就以散心为名要求她陪同自己的家庭到海滨度假——实际上她是想要享受克里奥提供的服务。由此得出的结论就同时反驳了滥美之词与尖刻抨击：与这两者不同价值取向的解读正相反，《罗马》甚至从来并没有尝试通过建立共通的女性经验，而是在不断地阻挠共通女性经验的最终形成。

从正统马克思主义角度出发对《罗马》所做出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同样适用于记录90年代中国深圳电子设备装配流水线上女性产业工人生活的重要民族志文本《中国女工》。正如《中国女工》的作者开篇明义地说明的那样，借助米歇尔·福柯的“自我技术”概念，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以及阿兰·图海纳的“社会行动者”概念等多样化的理论工具，《中国女工》并不试图从单一的阶级视角深描90年代“打工妹”的身份面貌，因为“新型打工主体的形成却仍然要比传统马克思主义对‘阶级’的看法——经常把主体视为纯粹抽象物或者生产手段与生产关系的结果——要复杂得多……中国的打工妹们正在对其生活道路进行着经历、体验、想象和反抗，由于这个新型社会主体的斗争是丰富、独特而多元的，因此她们的斗争不应该再被简化为政治化的‘阶级斗争’。” ②也就是说，相比于单纯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某种特定职能的承担者，或是某种“经济范畴的人格化”，作者在农民工、地方族群、女性等多元身份与正统马克思主义阶级身份的交叉与相互穿越中看到了对市场化负面力量做出抵抗的新工人主体性的生成。无论是在岗位上受到严格泰勒制规训权力摆布的异化劳动的身体，还是在父权的色情凝视中诞生的性欲的身体，或者是以方言口音进行分化的地域身份的身体，彼此之间都是相互不可化约的，都是从多种不同角度所进行的不同形式的抵抗，“打工妹”的身份因此也就不是一种单一身份，而是多元身份杂多聚合而成的松散去中心集合体。通过这种后现代风格的非本质主义操作，作者就将阶级身份，与建立在阶级身份基础上的阶级斗争，降格为了后现代多元身份与对复杂微观权力针锋相对的多种抵抗形式中的一种。阶级身份与阶级斗争，已经不被认为具有唯一的普遍性特权。

[](https://band.us/band/86180635/board/search/%E8%AE%BA%E6%97%A0%E4%BA%A7%E9%98%B6%E7%BA%A7%E4%B8%8D%E6%98%AF%E5%A4%9A%E5%85%83%E8%BA%AB%E4%BB%BD)

我们可以非常轻易地指责作者违背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做出的，对经济活动或者说“经济基础”在人类社会存在（对于马克思来说，这也就是人类的主体性存在，“此在”）中所起到的根本性作用的论述。作者也丝毫不否认在这个问题上她所代表的多元身份政治视野与马克思所强调的阶级斗争视野存在着决定性的分歧，《中国女工》是以前一种视点为中心对后一种视点进行吸收改造的尝试。作者的温和观点有完全滑向厄内斯特·拉克劳所持的完全修正主义立场的危险，对后者来说，阶级斗争不仅仅被降格为“新身份及其特殊要求”中的一种，而且“已经失去它的接合作用，而又没有获得任何新的精确意义”，换句话说，阶级身份正在失去政治动员作用。③**但此处我们真正应当做的事情是稍微转变一下问题，重新考虑作者对马克思主义阶级身份观点的复述，既“传统马克思主义对‘阶级’的看法经常把主体视为纯粹抽象物或者生产手段与生产关系的结果”是否真正涵盖了马克思主义的全部？是否如某种延绵不绝的说法所强调的那样，马克思主义代表了一种无视民族，性别，国家、肤色，地域，文化等等客观存在的差异的强还原性的经济决定论？是否马克思主义仅仅将多元身份政治简单贬斥为“分化无产阶级的布尔乔亚伎俩”？**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必要参考路易·阿尔都塞。作为法共的官方理论家，阿尔都塞在60年代末社会运动时期中的思想立场隐晦地倾向于背离法共路线的毛主义路线。在写作于1970年的一篇小短文《马克思主义与阶级斗争》中，阿尔都塞与法共的同床异梦和毛主义倾向公开显露了出来。在文章的一开始，他就急于宣布：“马克思的整个理论——即马克思所创立的科学（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所开创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的中心和核心，是阶级斗争”。④为了证明这一观点，阿尔都塞列举对马克思主义核心文本《资本论》的两种阅读方法：一种方法是将资本论作为“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来阅读”⑤，既将《资本论》视作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做进行的一般的，中立的“客观”解释。而这本未完成巨著所遗留下来的有关阶级与阶级斗争的最后一章恰好表明阶级仅仅是作为资本主义一般经济活动的后果，而阶级斗争又不过是两个对抗性阶级的阶级存在的后果；而另一种方式却要将《资本论》的章节编辑“头脚倒立”，**表明“马克思要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流通和分配的全部条件（从而整个所谓的政治经济），都被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渗透和统治着**”⑥，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在场不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终结果，而是作为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可能的前提。阿尔都塞的观点能够在《资本论》充满了大量历史经验材料的第一卷中直接得到佐证。无论是在论述从简单的手工工场生产向机器和大工业生产转化的第十二和第十三章中，还是在论述劳动力价格以及向工资形式转化的第十五至二十章中，以及在描述骇人听闻的原始积累过程的第二十四与第二十五章中，读者都能够轻易地看到资产阶级经济力量的形成与巩固从来都不是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开动所导致的结果，而是不断地受到超经济力量的直接或间接干预和调节。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既不是它自我设置的结果，也不是先于它而存在的生产方式自然演替的结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借助于对其自身而言是外部的，或者说是“构成性外部”的力量而建立起来的。

完全有理由将阿尔都塞在此的观点与他同期发表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的观点联系到一起。根据后一个文本，社会的总体生产方式中生产关系的部分有赖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样一个非经济体系来进行再生产。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与其他经济的或非经济的，国家的或市民社会的机器组合在一起，才构成了社会的整体结构。正是因为社会结构中非经济机器的存在，**经济就不可能是结构的唯一根本性决定因素，相反社会结构是一个由复数个不同的范畴中的复数矛盾所“多元决定”的体系**。

“只要承认上层建筑的形式和国内外环境在多数环境下是特殊的、独立的和不能归结为单纯现象的真实存在，矛盾的多元决定就是不可避免的合乎情理的……经济的辩证法从不以纯粹的状态起作用……无论在开始或结尾，归根结底其决定作用的经济因素从来都不是单独起作用的。”⑦

虽然在不同的文本之中，我们都能够看到阿尔都塞与（以一种典型的毛主义用法）被他称为“经济主义”的经济决定论战斗的努力，但更重要的是认清《马克思主义与阶级斗争》与《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矛盾与多元决定》之间不易察觉的微妙差异。在后一类文本中，阿尔都塞试图拆解包括经济要素在内的一切的单一决定要素，但在《马克思主义与阶级斗争》中，阿尔都塞直言不讳“马克思的整个理论……的中心与核心是阶级斗争”，在这里，单一性的普遍决定性因素是存在的，那就是阶级斗争。

无需过多论证，我们就能看出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矛盾与多元决定》中的观点与作者在中国女工中的观点存在着某种契合之出，上层建筑构造并不完全能够被化约为经济基础的产品或附属物，上层建筑不仅相对独立于经济基础，更能够对经济基础产生反作用。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为多元身份抗争取代阶级斗争的绝对中心性埋下伏笔，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这一概念，根据马克思主义，其定义是在经济领域内做出的。然而这种观点在《马克思主义与阶级斗争》中又遭到了全面的背叛，在《马克思主义与阶级斗争》种，阿尔都塞阐述了两个主要观点：首先，资本主义社会是“泛阶级斗争化”的，阶级斗争不仅仅是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统治的武器，也是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反抗的工具，当无产阶级没有进行反抗，恰恰就说明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所进行阶级斗争的有效性；其次，阶级斗争不可被还原为经济问题或是伦理问题，反过来，正是阶级斗争的态势决定了经济领域中的生产方式以及关于伦理和道德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

所以现在我们又应当如何理解阿尔都塞文本中的这种自相矛盾之处，社会结构的不可互相化约的特殊多元性与阶级斗争的单一普遍决定性，两者之中究竟哪一个才真正代表了阿尔都塞的理论重心？借鉴一种非常具有黑格尔辩证风格的策略，我们此时正是应该从两难抉择中跳脱出来，同时“扬弃”两个选项，并质疑构成这种对立，在当下我们主题中正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对立，的合理性。于是我们应当做的，就是再次扭转主题，详细考察在黑格尔的理论框架下应当如何处理特殊与普遍间关系的问题。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引述齐泽克所总结的处理特殊与普遍之间关系的四种不同模式：第一种，中性普遍性，这种普遍性被认为无涉与特殊性而独立于各种特殊性的干扰作为中立位置而存在；第二种，马克思主义批判/症候阅读法，普遍化行为在中立外衣之下本身就隐藏着一种抹除差异男性逻辑，界定着宰制与操纵的男性立场；第三种，这是由拉克劳发展的版本，普遍性的位置是空白的，有待填充的，而诸多特殊性则在对霸权的争夺中决定哪一个能够升格为普遍性；第四种，**也是对齐泽克而言最为重要的一种，具体的普遍性**。⑧根据齐泽克对黑格尔哲学所出的暴力解读，当黑格尔主张普遍性有可能与所有类型的特殊性取得协调而不是相互排斥时，这种普遍性就只能通过各种各样的例外，也就是普遍的否定形式得到表达。简而言之，这里是完全自相矛盾的，唯一可能的具体的普遍性就是普遍性自身在一切特殊之中的缺席，特殊的例外性是绝对的，普遍的。难道这不正是对应了精神分析中臭名昭著的所谓“菲勒斯中心主义”的拉康派版本吗？阴茎的能指，也就是菲勒斯，其对于女性主体的普遍化效力正根植于阴茎无法勃起的永恒潜在可能性，因为对于拉康来说菲勒斯就是这样一个悖论性的能指，它指代阴茎与意义的永恒阳痿，女性主体的激进之出就在于她完全认同阴菲勒斯的普遍化效力，因此也直接认同与菲勒斯与阴茎的普遍性无能，男性主体则求助于幻想永恒勃起的原初之父形象来规避永恒阳痿的尴尬。

注释：

① Žižek, *Roma is being celebrated for all the wrong reasons*, Spectator USA, 2019

② PY：《中国女工》，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

③ 巴特勒，拉克劳，齐泽克：《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胡大平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19页。

④ 阿尔都塞：《马克思主义与阶级斗争》，吴子枫译，《新史学》第14辑2015年版。

⑤ 同上。

⑥ 同上。

⑦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07~108页。

⑧ 紀傑克：《神經質主體》，萬敏澤译，桂冠圖書2004版第144~145頁。

⑨ 東浩紀, 存在論的、郵便的　ジャック.デリダについて,1994,P138-142

⑩ qtd. in Žižek, *Less Than Nothing,*2012, P581

⑪ 紀傑克：《神經質主體》，萬敏澤译，桂冠圖書2004版第147頁。

⑫ PY：《中国女工》，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188页。

⑬ 同上，第189页。

⑭ 转引自紀傑克：《神經質主體》，萬敏澤译，桂冠圖書2004版第355頁。

⑮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先刚译，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1页。

⑯ 见*VICE*中国频道的视频“这家冰激凌店老板要用薪资透明带我们对抗剥削”